



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重大项目成果丛书

Publication Series: MOE Supported Projects of Key Research Institutes of Humanities and Social Sciences in Universities

语言文学类 Linguistics and Literature

欧美学生汉语语法习得 与认知专题研究

孙德金 等著



北京大学出版社
PEKING UNIVERSITY PRESS

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重大项目成果丛书

欧美学生汉语语法习得 与认知专题研究

孙德金 等著



北京大学出版社
PEKING UNIVERSITY PRESS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欧美学生汉语语法习得与认知专题研究/孙德金等著. —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 2012. 10

(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重大项目成果丛书)

ISBN 978-7-301-21406-0

I. 欧… II. 孙… III. 汉语—对外汉语教学—教学研究 IV. H19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2)第 244473 号

书 名: 欧美学生汉语语法习得与认知专题研究

著作责任者: 孙德金 等著

责任编辑: 欧慧英

标准书号: ISBN 978-7-301-21406-0/H · 3158

出版发行: 北京大学出版社

地 址: 北京市海淀区成府路 205 号 100871

网 址: <http://www.pup.cn>

电 话: 邮购部 62752015 发行部 62750672 编辑部 62752028

出版部 62754962

电子信箱: zpup@pup.pku.edu.cn

印 刷 者: 北京鑫海金澳胶印有限公司

经 销 者: 新华书店

730 毫米×980 毫米 16 开本 26.25 印张 450 千字

2012 年 10 月第 1 版 2012 年 10 月第 1 次印刷

定 价: 58.00 元

未经许可,不得以任何方式复制或抄袭本书之部分或全部内容。

版权所有,侵权必究 举报电话: 010-62752024

电子信箱: fd@pup.pku.edu.cn

“中央高校基本科研业务费专项资金”资助
(supported by“the Fundamental Research Funds
for the Central Universities”)

本书作者

(按音序排列)

陈 晨
龚君冉
胡 旻
吉 英
刘 晶
孙 群
袁梦溪
张 琳
周晓芳

冯丽萍
韩 阳
胡媛媛
刘 佳
孙德金
田 靓
张 娣
赵 果

总序

崔希亮

随着中国综合国力的日益提升,中国在国际舞台上的作用越来越大,汉语也逐渐成为地区性或者国际性语言,因此带来了学习汉语的热潮。汉语热的背后是中国热,中国文化、中国社会、中国经济、中国政治、中国历史、中国武术甚至中医都吸引了越来越多的学习者和研究者。语言是学习中国文化、了解中国社会的桥梁。语言学习是有捷径的,方法对了可谓事半功倍。对于很多国家的学习者来说,汉语是一门很难学的语言。原因有三:第一,从类型学上看,汉语属于孤立语,语法形态不发达,有声调,对于其他语言背景的人来说习得较为困难;第二,汉语的书写系统不是字母文字,汉字是学习中的瓶颈,汉字难学使得很多学习者望而却步;第三,汉语作为第二语言教学的历史比较短,很多问题没有研究清楚,我们对汉语本身、对如何教、对学生的心理都缺乏足够的研究。基础研究的薄弱导致我们的教材、教学法、教学手段无法满足学习者的要求。在汉语国际推广的形势下,我们应该多研究一些实际问题,从大处着眼,从细微处着手。

北京语言大学对外汉语研究中心是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百所重点研究基地之一,是汉语作为第二语言研究的核心基地,在海内外汉语教学与研究领域有广泛的影响。中心自成立以来,承担了很多重要的科研项目,这些项目有的已经结项,有的还在进行当中。这批科研项目汇聚了北京语言大学以及海内外学者的研究力量,其成果的发表必将在学术界产生重要的影响,从而推动汉语作为第二语言的教学与研究。北京大学出版社愿意出版这套系列丛书,作为这套丛书的作者之一,我感到十分高兴。

对外汉语教学研究,或者称作汉语作为第二语言教学研究,是应用语言学的一个分支学科。这个学科的主要学术基础是汉语语言学、普通语言学理论、教学法、教学理论以及认知科学。对外汉语研究系列丛书的主

2 欧美学生汉语语法习得与认知专题研究

要著者都是北京语言大学对外汉语研究中心的驻所研究人员,他们的学科背景并不相同,有做语言学的,有做认知心理学的,有做计算机科学与技术,其中做语言学的有专攻语法学的,有专攻词汇学的,有专攻第二语言习得的,有专攻语言测量学的。尽管大家的学科背景不同,但是在合作研究的过程中互相尊重,取长补短,在合作中互相学习。课题组中也包括了一些来自其他领域的合作者和本中心的研究生。对外汉语教学是个新兴学科,也是一个交叉学科,在这个领域很多问题涉及语言学、教育学、心理学、计算机科学以及一些相关的学科,因此这样的学术研究背景多样化的组合是比较合理的。当然不同的学者有自己的学术取向和研究思路,不能要求大家齐步走。

基地研究课题的选择是经过专家论证的,内容涵盖了对外汉语教学急需解决的许多基本问题。例如赵金铭教授负责的《基于中介语语料库的汉语句法研究》,主要关注对外汉语教学中一些带有普遍性的语法问题。为了避免分析过程中的主观随意性,这个课题的研究素材来自于北京语言大学开发的“汉语中介语语料库”。张旺熹教授负责的《汉语教学参考语法研究》旨在为汉语教师和学习者提供一部系统完善的辅助工具书。我负责的《日韩学生汉语学习与认知专题研究》把关注的焦点放在日本和韩国学习者身上,因为他们目前是最大的学习群体。日本和韩国都属于汉字文化圈,日语和韩语中都有大量的汉语借词,然而这两种语言与汉语属于不同的类型,它们都属于黏着语,因而日韩学习者有很多共性的问题。宋柔教授负责的《面向对外汉语教学的多媒体资源库及检索分析工具研究》则从理论和实践的层面上解决教学资源的问题,目的是为对外汉语教学提供先进的技术手段。张博教授负责的《基于中介语语料库的汉语词汇专题研究》从词汇学的角度分析对外汉语教学中的词汇问题,研究易混词、多义词、同义词、反义词偏误现象,为词典编写、教材编写和课堂词汇教学提供参考依据。另外,目前还在研究过程中的项目有孙德金教授负责的《欧美学生汉语语法习得与认知专题研究》、张凯教授负责的《汉语作为第二语言的能力标准研究》、王建勤教授负责的《全球文化竞争背景下的汉语国际推广策略研究》、高立群教授负责的《基于教学实验的对外汉语教师教学认知能力及培训模式研究》、张劲松教授主持的《面向外国学生的计算机辅助汉语正音系统研究》、邢红兵教授负责的《留学生汉语词汇习得的计算机模拟研究》、张博教授负责的《不同母语背景的汉语学习者词语混淆分布特征及其成因研究》、江新教授负责的《不同

环境、不同背景的汉语教师观念之研究》、施春宏教授负责的《面向第二语言教学的汉语构式系统研究》、郑艳群教授负责的《多媒体驱动和语料库驱动与对外汉语教学研究》、曹文教授负责的《不同国别学习者的汉语语音语料库》、张黎教授负责的《提升汉语的国际商务语言地位的战略与对策研究》、姜丽萍教授负责的《“任务—活动”型汉语课堂教学模式构建与应用》和张赫教授负责的《基于类型学的汉语作为第二语言的“语别化”研究》，这些都是关系到汉语教学瓶颈问题的研究题目。对外汉语研究中心每年都会组织新的重大研究课题，我相信，通过努力，对外汉语教学的基础理论研究和应用研究在广度和深度上都会不断向前推进。北京大学出版社与北京语言大学对外汉语研究中心的这项合作出版计划能够惠及最广大的研究者和学习者，能够为汉语的国际推广事业添砖加瓦，这就是我最大的心愿。

欧美学生汉语语法习得与 认知研究综述(代前言)

孙德金

一 引 言

汉语作为第二语言习得的研究,自 20 世纪 80 年代以来,已经有了长足的发展。国内外学者运用不同的理论模式和研究方法开展研究,在“汉语作为第二语言是怎样习得的”这个根本问题上认识逐渐在深化。

在各类习得研究中,语法习得的研究一直受到重视,研究成果也相对多些。这种状况不仅存在于汉语作为第二语言的习得研究中,其他语言的习得研究也是如此。

第二语言语法习得研究有两个取向:一是共性的或称普遍性规律的探究,即不分母语背景,仅以对目标语的掌握情况来进行分析探究的取向;二是个性的,着眼于不同母语背景习得规律的探究。应该说两种取向都重要。笔者的看法是,找到人类语言(包括第一语言、第二语言、第三语言等)习得的普遍规律,这是语言及语言习得理论研究的目标,而要实现这个目标,就要尽可能多地了解每一种母语语言与目标语言之间的关系,看看有无影响以及影响的程度。尽管在理论上,不少学者坚持“先天论”,但似乎还没有足够的证据表明,母语对第二语言习得毫无影响。既然如此,还是应当先充分考虑母语背景因素对习得的影响,在此基础上去探究普遍的规律。

欧美学习者共同的母语基础就是印欧语系诸语言。既然是同一语系,自然在类型上有很大的共性,整体上与汉语这个汉藏语系的语言形成类型上的差异。这在汉语作为第二语言习得上会造成相应的影响。然而,尽管已经有不少学者做了或者单向或者双向的研究,得出了一些认识,但已经达成共识的结论不多,很多甚至是相互矛盾的。为了了解针对印欧语背景学习者的汉语第二语言习得研究的概貌,本文拟对过去 20 年

间的有关成果进行一番梳理。要说明的是,所涉及的主要是国内的成果,并尽量不遗漏重要的研究。此外,本文不包括纯粹共性的(不考虑母语背景)研究。

本文拟从(1)研究内容、(2)理论和方法、(3)问题和展望这三个方面,对欧美学生汉语语法习得与认知研究的文献进行较为全面的梳理和评述。

二 研究内容

传统语法包括词法和句法两个部分。随着研究的逐渐深入,人们对语法所辖的范围也逐渐扩展到语篇层面。以下按词法、句法、语篇三个层面的习得与认知研究进行评述。

2.1 词法

2.1.1 词法意识

有研究表明,对词素的分解组合能力是一种存在于多种语言中的普遍的词素意识;结构的能产性对词素意识的发展起重要作用(郝美龄,2003,转引自冯丽萍,2009)。外国学生在学习汉语过程中,词法规律是如何掌握的?词法意识的形成过程是怎样的?这是值得研究的问题。总体看,这方面的研究不多。冯丽萍(2009)以实验的方法对外国学生汉语词素意识的形成问题进行了研究。作者认为,汉语构词法意识的形成不仅需要具备对词素的分解与组合能力,而且需要更深一层的对汉语构词规律和两个词素之间关系的认识。基于此,作者确定了三个测验目标:词素辨别能力、词素聚合能力、构词法意识。一、二年级被试各84名,三年级被试42名,包括欧美、韩国等学生。研究得出了一些有意义的结论,比如关于构词法意识,作者指出,留学生构词法意识对词汇量的解释作用不明显,说明他们所形成的词素意识还只是较单纯的对词素意义的辨别与聚合,对词素的构词功能和构词方式等更深层的因素还不敏感。这一认识对教学有启发意义。

2.1.2 词类感知

作为词的功能表现,词类连接着词的意义和词的功能。学习者在第二语言习得中是怎样形成词的功能类型意识的?又是怎样在不同母语和目标语之间逐渐形成相关词类间的联系的?这些问题都还没有答案。袁博平(2002)、赵杨(2009)都把动词内的小类作为考察的对象,探讨英语母语学习者在习得汉语过程中对不及物动词(及心理动词)的习得和认知规

律。袁博平(2002)基于对不及物动词“纯不及物动词”和“假不及物动词”的分类,设计了一个实验,试图调查英语母语者头脑里两类不及物动词在句法上是否有不同的体现。结果表明,英语母语者是可以掌握汉语两种不及物动词的区别的,他们面对困难主要是如何把词汇的语义和在句法上的正确表达这个接口连接好。这一认识很有启发意义。赵杨(2009)研究的对象和袁博平(2002)相似,主要考察的是两类词,一是非宾格动词(如“碎”);二是心理动词(如“兴奋”)。研究采用两种测试方法:可接受性判断、组词成句。试图探讨的主要问题是,英语母语者在输入材料缺乏正面证据情况下,能否习得汉语上述两类动词的非使动特征?结果表明,英语母语者随着水平的提高能够习得心理动词的句法特征,而对于非宾格动词来说,学习者的中介语语法与汉语语法有显著差别,换言之,英语母语者容易掌握汉语心理动词没有使动的特征,容易习得,而不容易掌握汉语非宾格动词没有使动的特征,难以习得。这两项研究的意义不在于得出怎样的结论,而是为深入到动词及其他词类的深层语义和结构关系的探究提供了具有启发性的思路。

2.2 句法

2.2.1 句法成分

2.2.1.1 补语的习得

汉语作为第二语言习得研究中,补语一直是研究的重点之一。补语的各种类型中,趋向补语受到的关注较多,其次是情状补语,程度补语研究得较少。

趋向补语

杨德峰(2003)以语料库方法讨论了英语母语学习者汉语趋向补语的习得顺序。该文把来自中介语语料库^①中的全部427个用例,分初级(一、二年级)和中高级(三、四年级)两个层次,按照10个考察项目对偏误情况进行了定量分析,根据错误率和难易度的相关,最后构拟出母语为英语的学习者习得汉语趋向补语的大致顺序。该研究尽管在习得过程的划分和分析上有些粗疏,但所得出的认识对教学有参考意义。

情状补语

孙德金(2002)采用语料库方法,从中介语语料库中提取自然语料对

^① 本文所说的中介语语料库除特别说明外,均指北京语言大学20世纪90年代研发的“留学生中介语语料库系统”,语料规模为104万字。

“得”字补语句(包括三种类型:表程度、表情状、表可能)的习得情况进行分析。语料的母语背景为英语和韩语。主要得出以下认识:(1)总体上说,语料显示的错误发生率并不高,一定意义上说明,此类句子的习得难度不是很高;(2)学生在习得“得”字补语句过程中存在“一定之规”,显示出一定的规律性;(3)学生习得“得”字补语句,对“得”前词语有明显的类型意识;(4)学生在习得程度补语和情状补语时都存在一定程度的规则泛化问题;(5)母语背景为英语的学生习得“得”字补语句时存在少量体标记干扰现象。孙群(2008)在孙德金(2002)基础上专门对欧美学生汉语情状补语句的习得情况进行了研究。该研究重点探讨此类句子的习得过程和习得顺序,并进行偏误分析。研究采用问卷方法采集语料,57份有效问卷按学习时间分成初、中、高三个组,包括两种题型:翻译题、完形填空题。研究按结构将情状补语句分成7种类型,依正确使用相对频率法对7种类型进行排序,得出习得顺序。除了得出习得顺序外,该研究还得出如下认识:(1)各类型的情状补语句习得过程不一样,有的简单,有的难度较大;(2)学生习得中出现的偏误较多,偏误类型也不少;初级阶段欧美学生语际偏误较多,受母语负迁移影响产生错误;中高级水平的欧美学生语内偏误增加,对目的语掌握得不充分导致语法规则的泛化。这说明,至少就情状补语来说,习得的难度并不小,这一结果显然与孙德金(2002)有所不同,这可能与语料来源不同有关。

靳洪刚、章吟(2009)从语言形式教学法的角度考察“选择性注意”和“差异效应”对“得”字方式补语习得的影响。该研究采用实验方法,对象为30名美国大学生,分为两个实验组、一个对照组,系统考察两种不同的教学处理方法(输出加强、纠错反馈)是否引起“选择性注意”和“差异效应”,是否有利于“得”字方式补语的习得,研究结果证实了上述问题。由此作者强调,以语言结构为中心的教学在第二语言教学中是十分必要的,不能以交际为由而忽略了语言形式的教学。这一通过实证得出的认识无疑是值得充分重视的。

结果补语

袁博平(2011)以实验的方法对英语母语者汉语结果补语的习得情况进行了研究。该研究对55名被试按照语言水平测试结果分成初、中、高三个组,另有一个中国人组作为对照组,实验采用的测试为可接受性判断,让被试对5种类型(A—E)的含结果补语的句子进行判断。结果显示,英语母语者学习汉语结果补语时,句法特征重组和题元特征重组有不

同步现象,而造成这一现象的主要原因很可能是英语对于结果补语在题元结构上的限制。据此作者认为,在教学中,仅仅教授汉语结果补语的句法结构是不够的,有必要对汉语结果补语的题元关系做必要处理。这一认识是有启发意义的。以往在处理不同类型结果补语时,一般是从语义指向的角度分析,而针对英语母语者的问题,或许这种角度的认识会更有针对性。

补语综合研究

田靓(2011)采用实验方法对三类述补结构(动结式、动趋式、“得”字式)的习得情况进行综合考察。研究采用混合实验设计方案,59名被试的母语背景分别是英语、俄语、西班牙语,分初级、中高级两个水平。研究得出的主要认识是:(1)欧美留学生对汉语句法组合形式的掌握,以及他们对句法结构所表达语义的理解能力的发展是不平衡的。对于前者而言,学习者能通过提高自身第二语言熟练水平进而把握;而对于后者,学习者表现受到其母语显著影响;(2)母语背景差异参与学习者汉语第二语言的理解加工系统,但是受习得者母语的影响,欧美学习者对语言组合形式特点,比如句法标记等特征敏感性强,因此习得第二语言结构形式时,母语和第二语言可能彼此独立;(3)欧美留学生对汉语语法标记的抽象能力及标记意识,随着自身汉语水平的提高而逐渐提高;(4)欧美留学生在习得汉语述补结构时,以动词为中心建立起具有层次性的结构模式。

2.2.1.2 定语习得的

作为修饰成分,定语的习得问题一直未受到关注。事实上,汉语和印欧语系诸语言间在修饰结构方面存在着不小的类型差异,这对第二语言习得必然会造成影响。张琳(2005)基于汉英两种语言的修饰结构的对比,对欧美学生汉语单项定语的习得情况进行了考察。该研究采用问卷方法采集语料,将含单项定语的定中结构按照语义及形式类型分成11种类型,题目设计为“根据给出的英文句子排出汉语词语的顺序”,共110题,41名被试按学习时间分成初、中、高三个组。根据正确使用相对频率排出11种类型的习得顺序。作者通过对各类型习得情况的分析,得出如下主要认识:(1)学生对各类单项定语的习得存在一定顺序;(2)学习者对单项定语的习得受多种因素制约;(3)各类单项定语的习得过程是不一致的;(4)英汉定中结构的差异是造成欧美学生习得汉语单项定语时出现偏误的一个原因,但有些差异对欧美学生汉语单项定语的习得不构成显著干扰。

这项研究的启发意义在于,某些以往被认为不存在习得困难的语法

项目,其实恰恰由于不同语言间存在的或多或少的差异,对学习者造成了习得上的困难。这提示我们应该重视这类现象。

2.2.2 功能词

所谓功能词主要是相对于实体词而言的,主要是起语法功能作用。这类词的习得也是汉语第二语言学习的难点,受到习得研究者的关注。

2.2.2.1 介词

介词主要标记成分间的句法语义关系,是汉语和印欧语等很多语言中重要的语法手段。由于各种语言类型学特点的不同,介词的作用也有不同,必然造成习得上的困难。崔希亮(2005)基于中介语语料库对“在”等20个介词整体上考察了欧美学生汉语介词的习得情况,并对比了日韩学生和中国人的语料。该研究的一个特色是对欧美学生群体做了进一步的细分:俄语、西班牙语、意大利语、法语、德语、塞尔维亚语、英语,由此观察到,尽管总体上欧美学生群体比日韩、中国学生群体使用介词数要高,但在欧美学生群体内部,英语要比其他语言使用介词少。文章将介词使用偏误归纳为三类(结构、使用、表达)九种(介词冗余等)。文章的主要发现是欧美学习者共同的特点是过度使用介词。

对介词的整体性考察得出的是总体的倾向。而介词内部,各语义功能类和印欧语系各语言间又存在着复杂的关系,因此需要对介词内部各具体类型进行习得考察。胡媛媛(2007)基于汉英两种语言在“依据”范畴上的对比,考察了欧美学生汉语“依据”类介词的习得情况。该研究以问卷方式采集语料,对“按”、“照”、“按照”、“据”、“根据”、“依照”等6个“依据”类介词按结构分成8个类型(S1-S8),45名被试按学习时间分成A、B、C三个水平组,题型分三种:单项选择、判断正误并改正、排序。研究经过数据分析得出如下认识:(1)习得过程中存在一个客观习得顺序和一个主观习得顺序;(2)主客观习得顺序之间没有显著的相关,即不能从主观的习得顺序推知相应的客观习得顺序;(3)习得过程中存在一个客观习得等级和一个主观习得等级。作者还指出,由于英语中有与汉语“依据”类介词结构相类似的表达方式,如“according to、based on”等等,欧美学生往往低估了汉语“依据”类介词结构的难度,主观判断过易,出现母语负迁移。这些观察对于指导教学都有启发意义。

此外,白荃、岑玉珍(2007)对英语母语者还进行了介词“对”的偏误分析,归纳出了8种偏误类型。

2.2.2.2 助动词(能愿动词)

汉语助动词承担着重要的情态和语气表达的功能,和英语等印欧语相对应的情态范畴的表达形式之间存在着复杂的关系,因此也成为第二语言习得者的一个难点,偏误率很高。胡旻(2009)选择了使用频率很高的“能”作为研究对象,考察欧美学习者习得“能”的规律和特点。作者首先将“能”分成“能₁—能₄”4个义项,以英译汉、判断正误两种题型设计问卷,86名被试按学习时间分成初、中、高三组。研究得出了4个义项的“能”的习得顺序,并对各类偏误情况进行了分析。该研究值得注意的是对各类“能”的习得过程进行了阶段划分,比如“能”与“会”、“可以”的混同期和分化期等的分析就很有意义,遗憾的是未能进一步加以概括和理论提升。

2.2.2.3 反身代词

近二三十年来,反身代词的习得成为第二语言习得研究的热门话题之一。对这个问题的重视不是源自于语言教学实践,而是普遍语法(UG)理论影响的结果,是要解决普遍语法理论研究中的问题。

黄月圆等(2005)是目前所见研究汉语作为第二语言反身代词习得问题的一篇重要文献。文章试图回答的基本理论问题是,学习第二语言的成人是否仍然可及普遍语法(access to Universal Grammar)。该研究把研究对象分成英语母语组和日语母语组,并把汉语母语组作为对照组,采用测试判断和自然作文两种方法采集语料,对汉语反身代词“自己”的习得情况进行考察。得出的主要结论有:(1)具有中等汉语水平的日英两组留学生对“自己”的反应是在普遍语法允许的范围内,即普遍语法对这类学生具有可及性;(2)母语对反身代词习得有影响;(3)从作文的自然语料看,“自己”使用正确率高且自然得体,说明“自己”习得难度不高。该文在测试判断中显示出的一些特点值得从理论上做进一步的思考,比如句内各成分间的语义关系对“自己”所指的理解的影响,恐怕是一个重要的因素,即只考虑长短距离主语和宾语的约束问题对于全面认识反身代词的习得也许是不利的。

2.2.2.4 副词

副词这个类跨着实词和虚词,即有些词(或义项)实,有些词(或义项)虚,其困难并不表现在大的类上,主要是一个个具体的词(或义项),历来是习得分析中的一个重要内容。

在第二语言习得领域,国外学者对否定结构的习得研究很多,但对汉

语作为第二语言否定结构习得的研究较少。王建勤(1997)从中介语语料库提取了母语为英语的学习者的中介语语料,对914例有效的含否定副词“不”和“没”的例句进行分析。该研究得出的主要结论是:(1)“不”和“没”否定结构的习得过程是有序的;(2)被否定谓词与助动词的习得过程分析,揭示了谓词与助动词习得的阶段性特征;(3)“不”和“没”否定规则习得的扩散过程揭示了学习者学习新规则所经历的内在过程。该研究对两个否定副词习得过程的阶段性特征的揭示对于教学有重要的启发价值。在此基础上,王建勤(1999a)又利用中介语语料库研究了英语母语者汉语表差异比较的否定结构(和/跟……不一样)的习得过程。该研究的重点是,通过考察表差异比较的否定结构的习得过程看学习者经历怎样的结构分化与整合的过程。研究在理论上得出重要的认识:(1)关于分化过程中的学习策略,研究认为,英语背景的学习者所经历的这种分化过程实际上是一种繁化过程;(2)关于外化过程(“不”的前移过程)的心理机制,研究认为,外化过程实际上是基于目的语规则假设的泛化过程;(3)关于语境认知与模板制作机制及策略取向,研究认为,语境认知是以语境特征的分析与概括为特征的,其策略取向为学习策略;模板制作是以功能框架的分离与提取为特征的模式化过程,其策略取向应属于交际策略。这些结论显然触及了习得研究最深层的问题,即学习者习得过程的心理认知机制问题,富有启发性。

由于中介语语料库的语料构成和规模等因素对研究结论有着直接的影响,上述研究只能说是此种研究方法下的结论,还需要其他方法,比如追踪调查、实验等方法下的研究,才能对否定结构的习得规律有更加全面的认识。目前还缺乏在其他方法下进行的研究。

李晓琪(2002,2003)对英语母语者习得汉语副词“再”和“又”的规律和特点进行了研究。李晓琪(2002)研究对象是中级以上三个水平层次(中级、高级、入系生)的英语母语学生,语料采集方式为单句和语篇两个层次的填空作业,研究分别对“再”“又”各义项和用法进行了习得顺序的考察。该研究未能对“再”“又”两个副词在习得过程中关联性表现进行描写和分析,这是个遗憾。在此基础上,李晓琪(2003)又进一步对两个副词习得过程中的习得认知机制进行了探讨。研究采用实验方法试图讨论两个问题:(1)词义理解、认知模式;(2)词汇重现对词汇习得的影响。该研究主要的认识有两个,一是母语对两个副词的习得有影响;二是输入频率对两个副词的习得有影响。

2.2.3 时体成分

时体成分的习得在第二语言习得研究中占有重要位置。Gass & Selinker(2008:179)指出:“形态项长期以来一直是第二语言研究的一个专题,早期研究考察的是实际发生的语素并努力弄清楚它们的习得顺序。到了20世纪80年代,人们采用更复杂的方法研究时体形态的二语习得。”Andersen(1986,1991)形成了体假说:在习得与动词相关联或在动词上添加词缀的时体标记时,第一语言和第二语言学习者首先受到这些动词或谓项的内在语义方面的影响。(转引自 Gass & Selinker, 2008:179)

汉语第二语言时体习得的研究以往取得了一些成果。孙德坤(1993)通过对两名英语国家学生习得汉语“了”的追踪研究,得出了富有启发性的认识。赵立江(1997)在孙德坤的基础上进一步对“了”的习得过程进行研究,方法不同,但结论差别不大。Wen Xiaohong (1997)首次把“了”“着”“过”三个体标记放在一起研究。该研究发现,完成体的“了”先于句末助词“了”掌握,完成体“了”和经历体“过”先于持续体“着”掌握。杨素英、黄月圆、孙德金(1999)通过对中介语语料的断面研究,得出了和 Wen Xiaohong(1997)不同的结论:“着”和“过”尽管在初学阶段难于掌握,但随着学时等级的提高,这两个体标记逐渐被掌握,而“了”虽然初学阶段错误率并不高,但一直到高级阶段,“了”都有较高的错误率,说明“了”最后掌握。该研究还得出了体标记习得的新的认识:情状体(situation aspect)与汉语体标记的习得有很大的相关性。文章重点分析了句子情状类型同体标记习得的关系,认为句子情状类型影响了体标记“了”和“着”的习得,“过”不受句子情状类型的影响。孙德金(2000)在前项研究基础上进一步从动词情状和句法结构的角度对汉语体标记“了”“着”“过”的第二语言习得情况进行了考察。研究发现,外国学生在习得汉语体标记的过程中,存在着将时体意义与动词语义特征自然联系起来的心理机制;句法结构也是影响体标记习得的重要因素,与体标记意义一致的先习得,其他的后习得。这一结论不仅从汉语第二语言习得方面证明了上面提到的体假说,同时进一步从句法结构的角度认识到体标记的习得同所处句法结构间的依赖关系。Gass & Selinker(2008:179)在介绍体假说时认为“从本质上说,这是一个语义学方法,关注的是第二语言时体形态习得中词语方面的影响”。孙德金(2000)的发现表明,体标记的习得不仅与所附的动词的语义特征有关,而且和所处的句法结构有关。概括地说,体标记不可能是独立习得的,而是决定于所处的句内语境。余又兰(1999)通过对35名